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家庭互動型態、子女性別與幼兒社會能力之探討

Family Interaction Patterns, Children's Gender and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doi:10.30074/FJMH.200812_21(4).0002

中華心理衛生學刊, 21(4), 2008

Formosa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21(4), 2008

作者/Author：林惠雅(Huey-Ya Lin)

頁數/Page：351-377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8/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074/FJMH.200812_21\(4\).0002](http://dx.doi.org/10.30074/FJMH.200812_21(4).000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家庭互動型態、子女性別與幼兒 社會能力之探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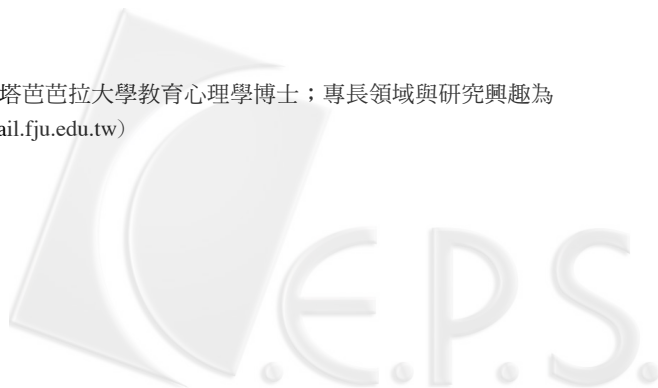
林惠雅

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目的是瞭解大台北地區學齡前兒童父母的家庭互動型態、子女性別與幼兒社會能力的關係。**研究方法：**本研究以大台北地區有5-6歲幼兒之未曾離婚或分居的父母及其幼兒為對象，本研究對象為744個家庭。**研究結果：**本研究結果顯示，首先，家庭互動有「建設型家庭互動」、「衝突型家庭互動」、和「破壞型家庭互動」三種型態。其次，不同家庭互動型態中的幼兒，其社會能力表現亦有不同，「建設型家庭互動」中的幼兒，其社會能力最好，「衝突型家庭互動」中的幼兒居中，表現最不好的是「破壞型家庭互動」中的幼兒。至於孩子性別方面，女生的社會能力優於男生，但男女幼兒不會因不同家庭互動型態而在社會能力上有顯著差異。**研究結論：**本研究同時檢視婚姻和教養聯盟二個家庭次系統，而且，家庭互動型態對幼兒社會能力而言確有作用，本研究發現可增加我們對於家庭系統和兒童發展關聯的釐清和瞭解。

關鍵詞：家庭互動型態、婚姻衝突、教養聯盟、幼兒社會能力、共親職

林惠雅：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教授；美國加州聖塔芭芭拉大學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長領域與研究興趣為親子關係、發展心理學。(E-mail: 002440@mail.fju.edu.tw)

收稿：2006年12月12日；接受：2007年4月18日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1980年代之前，國外有關家庭對於兒童發展的影響大都偏向個別探討母親—孩子關係、或父親角色、或婚姻關係等因素與兒童適應的關聯(Gable, Belsky, & Crnic, 1992)。1980年代以後，由於家庭系統觀點的興起，相關研究得以把個人因素、角色因素、關係因素全都納入家庭系統脈絡之中。另外，國外過去相關研究在探討家庭互動型態時，社會學學者大都偏重婚姻，而心理學學者則偏重親子關係或父母教養(Aldous, 1977; Belsky, 1981)。若單從婚姻的角度觀之，婚姻關係是家庭系統中的重要次系統之一，其和兒童各種功能的關聯受到學者的注意，許多研究結果發現婚姻品質和兒童適應有關(Holden & Richie, 1991; Howes & Markman, 1989, 1991; Jenkins & Smith, 1991; Jouriles, Murphy, & O'Leary, 1989; Miller, Cowan, Cowan, Hetherington, & Clingempeel, 1993; Porter & O'Leary, 1980; Reid & Crisafulli, 1990)。然而針對婚姻品質對於兒童適應的影響，一些研究結果發現婚姻衝突乃是預測兒童行為問題的重要指標(Buehler et al., 1998; Emery, 1982; Grych & Fincham, 1990; Hetherington, Cox, & Cox, 1982)。不過，Reid和Crisafulli(1990)進行後設分析(meta-analysis)發現婚姻衝突和兒童適應只存在中度關聯，這樣的結果引發對於婚姻衝突和兒童適應二者關聯的重新思考。思考之一是學者認為這方面的研究缺乏父母教養的探討(Emery, 1982; Gable et al., 1992)。同樣的，若單從教養的角度觀之，雖然相當多有關父母教養和兒童發展的研究發現二者有所關聯(Amato & Fowler, 2002; Baumrind, 1977; Hess & McDevitt, 1984; Steinberg, Lamborn, Darling, Mounts, & Dornbusch, 1994; Wentzel, Feldman, & Weinberger, 1991)，但這樣的研究似乎也忽略了婚姻系統的影響。因此，在家庭系統觀點的影響之下，學者認為相關研究若能同時探究婚姻衝突、父母教養與兒童發展的關係，則可以更完整瞭解複雜家庭系統的各種組成(Gable et al., 1992)。

然而上述研究方向之中，仍有一些重要問題值得關注，問題之一是有關婚姻衝突的探討。過去較多相關研究偏向以婚姻衝突本身作為探討的重點，包括頻率、形式與強度、內容、解決與兒童適應的關聯。不過，一些學者認為夫妻如何處理婚姻

衝突過程之重要性甚於衝突本身，換言之，婚姻衝突對孩子的影響並非來自衝突本身，如何表達和處理衝突的方式或對婚姻衝突的反應會對孩子帶來不同的結果和影響(Davies & Cummings, 1998; Ridley, Wilhelm, & Surra, 2001)。既然婚姻衝突的過程十分重要，而夫妻如何因應婚姻衝突或許是婚姻衝突過程中的一環，因此探究夫妻婚姻衝突因應具有重要的意義。

問題之二是有關父母教養的研究重點。國外有關父母教養的研究為數甚豐，然而過去相關研究大都以父母當中的一位作為研究對象，探討這一位父親或母親的教養型態及其對兒童發展的影響，其中母親更是過去相關研究的主要對象。然而這樣的研究重點可能忽略了父母教養其實包含了父母之間在教養議題上的互動，例如在教養孩子之際，父母對於同一個教養情境可能存在著各自的知覺和反應(Schoppe, Mangelsdorf, & Frosch, 2001)，且由於各自的知覺和反應，對於配偶的教養，父母可能表現出支持或抵制的行為。以此觀點來看，若只以父母當中的一位作為研究對象，很可能就忽略了父母彼此在教養議題上的互動。在如此考量之下，共親職(coparenting)面向之一的教養聯盟(parenting alliance)於是受到關注，並成為近年來家庭理論與研究方向之一(Talbot & McHale, 2004)。所謂教養聯盟，基本上指的是父母彼此在教養議題上作為夥伴的合作程度(McHale, 1997)。學者認為理想的兒童照顧需要父母之間對於教養議題的溝通、以及實際支持彼此教養的行為(Brody & Flor, 1996)。由於教養聯盟的概念受到重視，學者提出若能在一個研究中同時考慮教養聯盟和家庭其他過程，則可以對於家庭系統的複雜性以及兒童社會情緒適應有更多的洞察(McHale, Johnson, & Sinclair, 1999; McHale & Rasmussen, 1998)。

延續上述研究方向，從家庭系統的觀點而言，婚姻關係和教養聯盟均屬於家庭的次系統(McHale, Lauretti, Talbot, & Pouquette, 2002)，因此，研究中同時考慮婚姻衝突因應、教養聯盟與兒童發展的關聯確實有其重要的意義。然而後續有關婚姻衝突或教養聯盟與兒童發展關聯的研究中，卻多半只是個別檢視婚姻或教養聯盟，雖然二者各自與兒童發展的關聯得以瞭解，但我們卻不清楚這二者對於兒童發展是否具有交互作用的效果。若要進一步分析這二者交互作用的效果，作法之一是將二者視為彼此獨立的次系統，再檢視這二個獨立次系統彼此交互作用下對於兒童發展的

影響。然而這樣的作法或許仍有其限制，在實際生活上，雖然這二個次系統有其差異，婚姻關係是以夫妻之間的婚姻相關議題為主，而教養聯盟則是以父母之間的教養孩子相關議題為主，但二者並非完全獨立的次系統，學者指出家庭中某一個關係的知覺、情緒或行為會溢出(spillover)到其他家庭關係(Erel & Burman, 1995; Harold & Conger, 1997; Jouriles & Farris, 1992; Katz & Gottman, 1996)。從這個角度來看，婚姻衝突因應和教養聯盟彼此可能存在互動的關聯，換句話說，在實際生活上，婚姻衝突因應和知覺配偶對其教養的支持抵制可能因溢出效應而相互作用，並構成一個家庭互動型態，而這樣的家庭互動型態或許可以比較完整與真實的反映了婚姻和教養聯盟的交互作用。過去相當少相關研究做如此的分析，研究者認為若能加以探討，將有助於我們釐清婚姻和教養聯盟對於兒童發展所具有的交互作用效果，並進而瞭解複雜家庭系統的組合。

除此之外，過去相關研究較偏向以兒童內化或外化行為問題作為兒童適應的指標，較少從正向的社會能力面向來加以瞭解。Spence(2003)認為社會能力可能是兒童的情緒或行為問題的前置因素，亦即當兒童社會能力得以良好發展時，他們比較有能力去處理自身或人際的狀況，在此情況下，他們可能較不會形成情緒或行為問題；相對的，假如兒童無法發展良好社會能力時，兒童可能因而較缺乏能力去處理自身或人際的狀況，是故容易形成情緒或行為問題。陳若琳(2002)也認為社會能力是幼兒發展成功的指標。另外，對幼兒而言，社會能力主要在家庭中發展，受到家庭因素的影響頗鉅，因此探討家庭中父母婚姻衝突因應和教養聯盟所形成的家庭互動型態與幼兒社會能力的關聯，在理論與實務上均有其重要的意義。在探討兒童社會能力之際，Denham等人(2001)認為性別是孩子情緒和社會能力的調節變項，因此孩子性別也是本研究的重點。

基於以上研究動機，本研究主要目的是瞭解大台北地區學齡前兒童父母的家庭互動型態、子女性別與幼兒社會能力的關係，也就是在不同家庭互動型態以及不同性別的幼兒，其社會能力的差異。

二、文獻探討



(一) 婚姻衝突、教養聯盟與兒童適應

1. 婚姻衝突和兒童適應的關聯

有關婚姻衝突和兒童適應的關聯，早期的研究偏向婚姻衝突的頻率、形式與強度、內容、和解決這四個面向來加以探討，且獲得相當一致的結果。而Davies和Cummings(1994)在其文獻回顧中亦頗為完整的呈現相關研究結果，有關婚姻頻率的8個研究中，這些研究涵蓋12個月至15歲兒童，研究結果顯示婚姻衝突頻率越高，孩子行為問題越多，對父母後續衝突的反應也越強。而有關婚姻衝突表達的形式與強度之11個相關研究中，兒童年齡大致由12個月到12歲，研究結果顯示身體攻擊形式是強度最強的婚姻衝突表達方式，同時也是兒童負向反應、適應問題的危險因子，且身體攻擊形式比語言攻擊對兒童更具有負向的影響。在內容方面，由5個涵蓋3至17歲兒童的相關研究結果發現，如果婚姻衝突涉及孩子相關議題，對孩子而言是相當具有壓力的，且造成孩子更多的行為問題。最後，有關婚姻衝突是否得到解決方面，11個涵蓋2至19歲兒童的相關研究結果顯示，未解決的婚姻衝突引發孩子最多的憤怒和苦惱，其次是部分解決的衝突，而父母完全解決婚姻衝突的兒童與父母友善互動的兒童在憤怒和苦惱方面並無明顯差異。

近年來，相關研究正朝著新的方向進行，方向之一是注意婚姻衝突的過程，Ridley、Wilhelm和Surra (2001)認為對於婚姻品質而言，夫妻如何處理婚姻衝突過程之重要性甚於實際的衝突內容，因此，對婚姻衝突的反應是理解衝突導致婚姻實質苦惱的根本要素。方向之二是探討婚姻衝突和孩子適應關聯的機制。有關機制的理論觀點方面，Davies和Cummings(1994)所提之情緒安全假設是相當重要的理論觀點之一，他們強調婚姻衝突使得孩子有較高、較多的憤怒或苦惱等負向情緒，造成其不安全感，因而影響孩子有效因應生活問題的能力。換言之，情緒不安全感降低孩子有效因應生活壓力與挑戰的能力，並降低情緒和行為的調節能力。除了婚姻衝突直接影響孩子的情緒安全感而後影響其適應之外，該理論觀點提出孩子所經驗到家庭脈絡其他面向，也會藉由中介或調節的途徑來影響孩子的情緒安全感(Davies, Harold, Goeke-Morey, & Cummings, 2002)。因此，學者認為若僅只研究婚姻衝突，或許對於家庭因素的瞭解過於單薄，須將家庭脈絡其他面向納入並統整成為一個較大的

家庭架構，因較大的家庭架構提供了所謂家庭脈絡，如此一來，婚姻衝突和兒童適應關聯才得以清楚的釐清(Harold, Shelton, Goeke-Morey, & Cummings, 2004)。

至於國內有關婚姻衝突和孩子發展的關聯，一些相關研究偏向以前青少年期(張虹雯、郭麗安，2000)、國中生(陳惠雯、林世華、吳麗娟，2001)、專科生(黃玉、樓美玲，2004)的子女為對象，探討婚姻衝突或爭吵時的三角關係運作與青少年的行為問題或適應的關聯。另外，呂翠夏(1993)則回顧國外有關婚姻衝突與兒童社會情緒發展的相關文獻資料。因此，有關婚姻衝突和兒童發展的相關研究不多，值得進一步的探討。

2. 教養聯盟與兒童適應

如前所述，教養聯盟指的是父母支持或抵制配偶教養子女的努力(Gable, Crnic, & Belsky, 1994)。在意涵上，可以是父母對於配偶教養子女的支持或抵制行為(Emery, Fincham, & Cummings, 1992; Gable, Crnic, & Belsky, 1994; Schoppe, Mangelsdorf, & Frosch, 2001)，也可以是父母知覺配偶對自己教養子女加以支持或抵制的行為(Brody & Flor, 1996)。而Lindsey和Mize(2001)認為父母之間的教養聯盟是孩子發展的重要決定因素。雖然在概念上，學者同意教養聯盟是孩子發展的重要決定因素，但教養聯盟與兒童發展的相關研究卻不多，而有待繼續加以探討。

在為數不多的相關研究中，一些研究以觀察家庭互動的方式來蒐集父母親實際支持或抵制配偶教養子女之行為，進而探究其與兒童適應的關聯。例如Emery、Fincham和Cummings (1992)發現父母支持配偶行為和孩子的自我調節能力有關。Belsky、Putnam和Crnic (1996)發現父母不支持配偶的行為越多，孩子的抑制力越低，相對的，父母不支持配偶的行為越少，孩子的抑制力越高。而Schoppe、Mangelsdorf和Frosch (2001)也發現幼兒3歲時，若父母實際支持的教養聯盟越多，幼兒4歲時的外化行為問題越少，相對的，若父母實際抵制教養聯盟越多，孩子外化行為問題越多。有別於上述觀察方法，Brody和Flor(1996)則以非裔美國兒童和青少年家庭為對象，使用問卷方式調查父親和母親知覺配偶對其教養的支持程度，並測量孩子的外化和內化行為問題，而後分別分析父親和孩子、母親和孩子的資料。研究結果顯示父親知覺母親對他的支持程度越高，孩子內化行為問題越少；而母親知覺父親對她的支

持程度越高，孩子外化或內化行為問題也越少。為什麼父母教養聯盟會與兒童適應有關呢？其可能的機制之一是由於教養聯盟涉及教養子女議題與教養行為的聯合，反映了家庭互動品質，父母知覺配偶的支持或實際支持行為增加家庭互動的凝聚力及和諧，並創造一個孩子和父母均感舒適的氛圍，使得孩子有安全感，相對的，知覺配偶的抵制或實際的抵制行為導致父母越來越陷入於自己的衝突和情緒，並減少親子參與或親子互動的和諧，如此一來，孩子降低自我調節能力，進而產生行為問題(Belsky, Putnam, & Crnic, 1996; Brody & Flor, 1996; McHale & Rasmussen, 1998)。

國內有關教養聯盟的研究才開始起步，綜合國內研究結果發現，在實際行為或對配偶的知覺上，父母相互支持比不支持的多(呂翠夏，2002；林惠雅，2007；陳富美、利翠珊，2004)。另外，陳富美和利翠珊(2004)、林惠雅(2007)發現在感受配偶的被動支持、積極抵制、消極抵制方面，父母無顯著差異，然而父親所感受到太太的主動支持行為，明顯高於太太所感受到先生的主動支持行為。但呂翠夏(2002)卻發現父親和母親對於配偶的支持並無顯著差異。

(二) 兒童性別的關聯

1. 孩子性別與社會能力

所謂社會能力，Rose-Krasnor(1997)定義為人際互動的效能，是符合發展需求之有組織的行為。對幼兒來說，社會能力是同儕互動中，正向參與和自我調節所組織而成的行為。陳若琳(2002)則將幼兒社會能力定義為幼兒能適應學校環境以及能與同儕良好相處的行為能力，正向行為包括合群合作、親和互動、禮貌、獨立自主等等。

至於孩子性別與社會能力的關聯，Denham等人(2001)認為性別是孩子情緒和社會能力的調節變項。綜合相關研究發現，女孩的社會能力優於男孩(Crombie, 1988; Denham et al., 2001; Putallaz, Hellstern, Sheppard, Grimes, & Glodis, 1995; Prior, Smart, Sanson, & Oberklaid, 1993)。國內陳若琳(2002)亦發現在幼兒階段，女孩比男孩表現出較多禮貌以及獨立的正向行為。Prior等人(1993)認為男女孩的社會能力差異，其主要原因是在幼兒階段，男孩在難養育的氣質向度上就比女孩來得高，因此男孩在社

會能力上就比女孩來得有問題。Putallaz等人(1995)亦認為女孩比男孩更具直覺性，因此，女孩更具有察覺他人意圖、以及形成解決社會問題的有效方法的整體能力。除了從孩子內在特質來看之外，男女孩的性別角色社會化過程可能也有所不同。例如，女孩社會化過程較偏向成人導向，她們比較受到成人評價的影響，她們也比較被鼓勵去接近父母或老師、或表現符合性別角色規範的行為，如溫暖、順從、利他等，而男孩則是同儕導向，比較受到同儕評價的影響，並可能積極的對抗成人權威(Baruch & Barnett, 1981; Serbin, O'Leary, Kent, & Tonic, 1973; Stein & Bailey, 1973; Tauber, 1979)。

2. 婚姻衝突、教養聯盟、孩子性別與兒童適應

在有關婚姻衝突和兒童適應關聯的相關研究中，孩子性別也是討論的重點。Grych和Fincham(1990)回顧過去相關研究提及，在早期研究中發現婚姻衝突和男生行為問題的關聯高於女生，主要的原因是女生在衝突中受到的底護多於男生；然而後期研究卻發現，婚姻衝突和男孩適應或女孩適應均有顯著的關聯，以及婚姻衝突和男女孩的內外化行為問題均有顯著關聯，顯示不論男孩或女孩都受到婚姻衝突負向的影響。至於教養聯盟和兒童適應的關聯中，較少涉及孩子性別議題。

(三)綜合評論與本研究的觀點

針對上述國內外相關文獻，首先，國內外探討婚姻衝突因應、知覺配偶的教養聯盟、孩子的社會能力的相關研究為數頗少，本研究以此作為研究主題實有其重要性。再者，前述有關教養聯盟與兒童適應關聯的研究引發研究者的思考，首先，從教養聯盟的意涵來看，教養聯盟關心父母在教養議題上的互動，因此，以觀察家庭互動來蒐集父母親實際支持或抵制配偶教養子女之行為是較為符合教養聯盟意涵的方法。然而觀察家庭互動也有其限制，例如研究經費、時間，以及參與意願等因素的影響之下，參與的研究樣本人數可能無法太多。另外，Brody和Flor(1996)調查父母知覺配偶對其教養的支持，但卻分別分析父親和母親的資料，這樣的分析方式只能瞭解父母一方的情形，可能比較無法提供父母互動的面貌。基於考量上述研究方法，研究者認為應將父親和母親知覺配偶支持或抵制的資料加以同時分析，一來，

可以反映父母雙方在教養議題的互動狀況；二來，測量父母知覺配偶對其教養的支持或抵制，在性質上或許和父母實際支持或抵制行為有所不同，但若能將父親和母親的資料同時分析的話，其所反映的教養議題的互動或許相當類似，例如父親知覺母親支持其教養，同時母親亦知覺父親支持其教養，在教養議題的互動上，父母如此正向知覺可能形成正向和諧的品質，而這種教養議題的互動應類似於父母彼此支持對方的教養所形成的互動。三者，過去許多相關研究偏向個別檢視婚姻衝突或是教養聯盟與兒童適應的關聯，研究者認為若能同時將父親和母親的婚姻衝突因應和教養聯盟的資料加以統整分析為家庭互動型態，婚姻衝突因應和教養聯盟之間的交互作用可藉由家庭互動型態得以瞭解。最後，過去探討孩子性別對於婚姻衝突和兒童適應關聯作用的相關研究，大都偏向頻率、形式與強度、內容、解決四個面向，並以孩子行為問題作為兒童適應的指標(Grych & Fincham, 1990)，然而如果研究主題改以婚姻衝突因應以及正向的社會能力來看，孩子性別的效果將會如何？若再進一步思考，以上述家庭互動型態而言，孩子性別對於家庭互動型態和兒童社會能力的關聯是否具有作用？這方面值得加以探討。

基於以上文獻的探討，本研究主題或許具有一些重要的意涵。本研究涵蓋婚姻和教養聯盟二個家庭次系統，並嘗試以父母對偶為單位來分析父母婚姻衝突因應與教養聯盟所形成的家庭互動型態，藉由家庭互動型態，我們得以理解父母彼此在婚姻和教養聯盟的交互作用，對於理論的建構具有前瞻性。另外，本研究從正向的社會能力加以著手，或許可以協助我們釐清孩子正向發展的因素，並協助孩子朝此正向方向發展。最後，國內有關本議題的研究可謂少之又少，本研究或許提供一個較為完整與前瞻的研究視野，並且本研究主題的探討或許有助於釐清本土之情形，並作為理論建構和實務工作推行之參考。

三、研究方法

(一) 研究樣本

本研究以大台北地區5-6歲幼兒及其父母為對象，而父母未曾離婚或分居。以

學前兒童父母和幼兒作為研究對象的原因是，對父母來說，幼兒階段的孩子精力充沛，同時他們更需要父母提供經常性的保育和教育(陳若琳、李青松，2001；陳富美、利翠珊，2004；McCubbin & Patterson, 1983)，因此學前兒童父母面對更多親職方面的挑戰。本研究樣本包含台北12個行政區，以及台北縣的10市、7鄉和4鎮。抽樣程序是首先以上述地區的5-6歲幼兒人口比例為考量基準，再由上述地區中之幼兒園大班中抽取父親、母親和幼兒。獲得父母同意參與研究之後，問卷調查員分別和父親、母親聯絡填答「婚姻衝突因應」、「教養聯盟」問卷的時間和地點，問卷調查員於約定時間親自帶問卷前往約定地點供父親或母親填答，填答之後加以回收。幼兒社會能力的測量方面，則由目標幼兒的幼兒園老師依據平日對該幼兒的觀察瞭解加以填答。上述台北市各行政區及台北縣各市鄉鎮，共計約有110所幼兒園大班參與，約有133位幼兒園老師參與評量目標兒童的社會能力，每位老師大約評量2到10位幼兒，平均而言，幼兒與評量老師的人數比例約為5.59。

本研究樣本為744個家庭，包括父母與幼兒為研究對象。研究樣本中，幼兒性別分別是男童384位，占51.6%；女童360位，占48.4%；父親年齡層分佈，較多為36-40歲者(佔45.2%)和41歲以上者(佔30.1%)，母親年齡層分佈則是以36-40歲者(佔42.9%)和31-35歲者(佔32.7%)居多；父親的教育程度以高中職者(佔33.2%)和專科(佔29.2%)居多，母親的教育程度以高中職者(佔42.1%)和專科(佔29.7%)居多；父親的職業以受雇工商服務和自營工商服務居多(分別佔54.7%、25.9%)，母親的職業以受雇工商服務和軍公教居多(分別佔39.9%、19.0%)；父親收入以3萬1元至6萬者較多(佔60.6%)，母親較多為3萬1元至6萬者(佔40.1%)和3萬元以下者(佔35.5%)較多。

(二) 研究工具

1. 婚姻衝突因應

婚姻衝突因應採用林亞寧(2003)所修訂編製之「婚姻因應量表」，該量表包含六種因應策略的概念，為「正向回應」、「尋求社會支持」、「爭執」、「自我責備」、「自我興趣」、「逃避」，採Likert式5點量表計分，1代表從未如此；2代表偶而如此；3代表有時如此；4代表常常如此；5代表總是如此。由於考量「尋求

社會支持」較非屬於夫妻之間的直接因應策略，故本研究只測量「正向回應」、「爭執」、「自我責備」、「自我興趣」、「逃避」等五項因應策略。「正向回應」是個人採取主動與伴侶身體接觸、對伴侶表達關懷與愛意、共同參加活動等因應策略；「爭執」是個人採取與伴侶正面衝突、批評伴侶、對伴侶發怒等因應策略；「自我責備」是個人採取否定自我能力、自責等因應策略；「自我興趣」是個人採取獨自從事其他活動、發展個人興趣等因應策略；「逃避」是個人採取拒絕與伴侶討論該問題、以及壓抑心情感覺等因應策略。原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分別為.84、.89、.86、.74、.74。

由於原量表因樣本人數太少的關係而未進行因素分析，故本研究以主成份分析和直交轉軸方法分別針對父親和母親的婚姻衝突因應進行因素分析。因素分析結果與原量表的概念相似，父親部分共有5個因素，因素總解釋量為52.09%。因素一「爭執」，因素解釋量為14.65%，共有11題，此因素主要是採取與伴侶正面衝突、批評伴侶、對伴侶發怒等因應策略；因素二「正向回應」，因素解釋量為14.09%，共有12題，此因素主要是採取主動與伴侶身體接觸、對伴侶表達關懷與愛意等因應策略；因素三「自我責備」，因素解釋量為11.36%，共有9題，此因素主要是採取否定自我能力、自責等因應策略，其中第15題「拒絕與配偶發生性行為」，由於因素負荷量(-.106)少於.30，故予以刪除；因素四「自我興趣」，因素解釋量為6.02%，共有5題，此因素主要是採取獨自從事其他活動、發展個人興趣等因應策略；因素五「自我逃避」，因素解釋量為5.97%，共有5題，此因素主要是採取拒絕與伴侶討論該問題等因應策略。

母親部分也有5個因素，其內涵與父親相當相似，因素總解釋量為50.06%。因素一是「正向回應」，因素解釋量為14.33%，共有12題；因素二是「爭執」，因素解釋量為13.75%，共有13題；因素三「自我責備」，因素解釋量為11.17%，共有9題；因素四「自我興趣」，因素解釋量為6.33%，共有5題；因素五「自我逃避」，因素解釋量為4.49%，共有3題，其中第15題「拒絕與配偶發生性行為」，由於因素負荷量(.228)少於.30，故予以刪除。經本研究樣本之信度分析，父親之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分別為.91、.90、.88、.72、.77；母親之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分別

為.90、.89、.87、.74、.67。

2. 教養聯盟

為瞭解父母所知覺到的教養聯盟，本研究採用陳富美和利翠珊(2004)編製的「共親職量表」，該量表測量父母知覺到配偶對其教養孩子的支持或抵制之程度，適用於3至6歲幼兒之父母，共有20題，採Likert式5點量表計分，1代表完全沒有；2代表偶而如此；3代表有時如此；4代表常常如此；5代表總是如此。該量表包括四個因素，分別是「主動支持」、「被動支持」、「積極抵制」、「消極抵制」。「主動支持」包含知覺配偶促進、鼓勵或協助其與孩子之間的情感交流等行為；「被動支持」包含知覺配偶對其教養行為執行的協助與加強；「積極抵制」包含知覺配偶對其管教行為加以反對、爭辯、干涉、批評；「消極抵制」為知覺配偶對其執行教養行為時的不協助、及打岔行為。該量表之因素解釋量分別為12.4%、17.2%、18.4%、11.3%；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分別為.76、.84、.85、.76。經本研究樣本之信度分析，父親之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分別為.86、.87、.89、.79；母親之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分別為.86、.88、.90、.77。

3. 幼兒社會能力

為瞭解幼兒社會能力，本研究採用陳若琳(2005)編製的「幼兒社會能力量表」。該量表適用於4至6.5歲幼兒，共有43題，採Likert式5點量表計分，1代表幾乎沒有；2代表不常；3代表偶而；4代表時常；5代表幾乎總是。該量表包括五個因素，分別是「利他行為」、「合群合作」、「互動行為」、「禮貌」、「獨立自主」。「利他行為」指的是主動留意他人需要、表現關心別人的行為、懂得照顧弱小與適度的妥協與讓步等行為。「合群合作」指的是能與同伴合作、能遵守規則參與團體活動等行為。「互動行為」指的是會加入其他孩子的活動、邀請其他人一起玩或活動等。「禮貌」指的是會注意與他人相處的禮節、會愛惜別人的物品、會為自己的過失道歉並做補救工作。「獨立自主」指的是能獨立工作或遊戲、會保護自己的權利或物品、能負責以及處理自己能力所及的事務、以及能向他人表達自己的看法等。該量表五個因素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分別為.89、.88、.87、.88、.85。經本研究樣

本之信度分析，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分別為.95、.96、.95、.94、.93。

四、結 果

(一) 父母家庭互動型態的分析

為瞭解父母在婚姻衝突因應、知覺配偶對其教養之支持或抵制所形成的家庭互動型態，本研究先進行對偶資料的集群分析(cluster analysis)。首先，將五項婚姻衝突因應策略和四項教養聯盟面向分別略予以簡化，由於考量婚姻衝突因應策略中「自我責備」、「自我興趣」、「逃避」均屬於不正面面對衝突的因應策略，故將「自我責備」、「自我興趣」、「逃避」三項因應策略的分數加總成為「消極」因應策略，並保留「正向回應」、「爭執」二項因應策略。父親和母親在婚姻衝突因應的正向回應(父： $M=2.72$, $SD=.74$ ；母： $M=2.61$, $SD=.74$ ； $t=4.10$, $p<.001$)、爭執(父： $M=1.64$, $SD=.58$ ；母： $M=1.73$, $SD=.52$ ； $t=-4.67$, $p<.001$)、消極(父： $M=1.96$, $SD=.49$ ；母： $M=2.02$, $SD=.50$ ； $t=-2.88$, $p<.01$)有顯著差異，配對 t 檢定的結果顯示父親採用正向回應顯著多於母親，而母親採用爭執、消極因應策略則顯著多於父親。同樣的，由於教養聯盟中的「主動支持」和「被動支持」均屬於支持性質，故將「主動支持」和「被動支持」的分數加總成為「支持」因素，而「積極抵制」和「消極抵制」均屬於抵制性質，故將「積極抵制」和「消極抵制」的分數加總成為「抵制」因素。父親和母親在支持(父： $M=3.53$, $SD=.81$ ；母： $M=3.43$, $SD=.86$ ； $t=4.30$, $p<.001$)有顯著差異，配對 t 檢定的結果顯示父親感受配偶對其教養的支持顯著高於母親感受配偶對其教養的支持。至於抵制，父親和母親未顯示顯著差異(父： $M=1.87$, $SD=.70$ ；母： $M=1.86$, $SD=.70$ ； $t=.72$, $p>.05$)。

其次，父母對偶資料依據三個步驟進行分析。步驟一是計算父母在婚姻衝突因應的「正向回應」、「爭執」和「消極」、以及知覺配偶對其教養之「支持」和「抵制」的相關係數(見表一)，整體而言，除了父親「正向回應」與「消極」、以及母親「正向回應」與「消極」未呈顯著相關之外，其餘各項，不論就父親或母親本身而言，或是就父母之間而言，「正向回應」、「支持」之間呈顯著正相關，「爭

表一 父母婚姻衝突因應、教養聯盟各面向之相關

		婚姻衝突因應						教養聯盟			
		父			母			父			母
		正向	爭執	消極	正向	爭執	消極	支持	抵制	支持	
婚姻衝突因應											
父	爭執	-.26***									
	消極	-.05	.69***								
母	正向	.50***	-.20***	-.10**							
	爭執	-.16***	.48***	.41***	-.17***						
	消極	-.09*	.38***	.45***	.04	.65***					
教養聯盟											
父	支持	.50***	-.38***	-.22***	.43***	-.35***	-.16***				
	抵制	-.28***	.54***	.46***	-.22***	.45***	.30***	-.37***			
母	支持	.43***	-.34***	-.22***	.53***	-.32***	-.21***	.67***	-.35***		
	抵制	-.23***	.46***	.35***	-.23***	.54***	.39***	-.36***	.61***	-.37***	

* $p < .05$; ** $p < .01$; *** $p < .001$

執」、「消極」、「抵制」之間呈顯著正相關，「正向回應」、「支持」二者與「爭執」、「抵制」二者呈顯著負相關。

步驟二乃是進行集群分析，將父親和母親在婚姻衝突因應的「正向回應」、「爭執」和「消極」，以及教養聯盟中的「支持」和「抵制」一起考慮，並以父母對偶作為分析單位，加以進行階層集群分析(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因此每一對父母都有十個分數來反映他們婚姻衝突因應策略和教養聯盟。從上述階層集群分析之合併後組內差異係數來看，步驟741至742間係數增加9.492，步驟742至743間係數增加7.157，因此決定將744對父母的婚姻衝突因應和教養聯盟分為三個集群。集群1包括293對父母，集群2包括334對父母，集群3包括117對父母。

步驟三進行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以瞭解上述三個集群的特色。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以集群別作為自變項，婚姻衝突因應的「正向回應」、「爭執」和「消極」，以及教養聯盟中的「支持」和「抵制」作為依變項，結果顯示集群別的主要效果達顯著水準(Wilks' Lambda $F_{(20,1464)} = 100.176, p < .001$)。接下來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以集群別作為自變項，父母各自在婚姻衝突因應的「正向回應」、「爭執」和「消極」策略，以及教養聯盟中的「支持」和「抵制」分別為依變項，

結果顯示集群2在父親和母親的「正向回應」、「支持」顯著高於集群1和集群3，在父親和母親的「爭執」、「消極」、「抵制」均顯著低於集群1和集群3，也就是面對婚姻衝突時，集群2最常採用正向回應的因應策略，最少採用爭執或自我責備、自我興趣、逃避的因應策略，同時，集群2最常知覺到配偶對其教養的支持，最少知覺到配偶對其教養的抵制，而父親和母親這種相互正向回應以及知覺支持所構成的家庭互動型態，呈現正向建設性的特徵，所以命名為「建設型家庭互動」(constructive pattern of family interaction)。

至於集群1和集群3二者，除了上述和集群2的顯著差異之外，二者在父親和母親的「正向回應」、「支持」並無顯著差異，二者主要差異是集群3在父親和母親的「爭執」、「消極」、「抵制」均顯著高於集群1，亦即面對婚姻衝突時，集群3最常採用爭執或自我責備、自我興趣、逃避的因應策略，較少採用正向回應的因應策略；同時，集群3最常知覺到配偶對其教養的抵制，較少知覺到配偶對其教養的支持，而父親和母親這種較為高度的爭執、消極因應、以及較為高度知覺配偶的抵制，呈現彼此破壞對立的特徵，故命名為「破壞型家庭互動」(destructive pattern of family interaction)。而集群1則是介於集群2和集群3之間，亦即他們不像集群3那麼高度爭執和消極因應，但又多於集群2。在正向回應和知覺支持二方面，雖然他們和集群3相似，但卻又明顯的少於集群2，換言之，他們不像集群3那麼破壞對立，但仍具有負向衝突的特徵，因此命名為「衝突型家庭互動」(conflictive pattern of family interaction)(見表二)。

(二)家庭互動型態、子女性別與幼兒社會能力的關係

為瞭解父母家庭互動型態、子女性別與幼兒社會能力的關係，本研究進行二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先將幼兒的「利他行為」、「合群合作」、「互動行為」、「禮貌」、「獨立自主」各面向的得分加總為整體「社會能力」的得分。而後以家庭互動型態、幼兒性別作為自變項，幼兒社會能力的「利他行為」、「合群合作」、「互動行為」、「禮貌」、「獨立自主」和「社會能力」作為依變項，結果顯示家庭互動型態的主要效果達顯著水準(Wilks' Lambda $F_{(10,1468)}=12.624, p < .001$)；幼兒性別的主要效果達顯著水準(Wilks' Lambda $F_{(5,734)}=8.439, p < .001$)；然而家庭互

表二 各集群在婚姻衝突因應、教養聯盟之平均值、標準差和F值

		集群1		集群2		集群3			
婚姻衝突因應		M	SD	M	SD	M	SD	$F_{(2,741)}$	Scheffe事後比較
父	正向	28.69	6.65	37.74	8.38	28.49	7.69	130.804***	2>1;2>3
	爭執	18.20	4.37	14.48	3.22	27.91	6.72	405.139***	3>1;3>2;1>2
	消極	36.39	6.95	33.92	7.70	49.80	8.60	194.731***	3>1;3>2;1>2
母	正向	27.20	6.63	36.37	8.25	27.70	8.12	128.671***	2>1;2>3
	爭執	23.13	5.29	19.33	5.04	30.54	7.12	181.459***	3>1;3>2;1>2
	消極	34.56	8.03	31.50	7.18	42.24	8.40	83.938***	3>1;3>2;1>2
教養聯盟									
父	支持	30.77	6.34	41.11	5.03	30.17	8.26	268.498***	2>1;2>3
	抵制	18.93	5.20	15.02	4.11	28.78	7.68	297.994***	3>1;3>2;1>2
母	支持	29.45	6.20	40.43	5.82	28.58	8.72	274.581***	2>1;2>3
	抵制	19.04	5.33	15.00	4.14	27.56	8.70	223.990***	3>1;3>2;1>2

*** $p < .001$

動型態和幼兒性別交互作用的主要效果未達顯著水準(Wilks' Lambda $F_{(10,1468)} = 1.616$, $p > .05$)。接著，以家庭互動型態作為自變項，幼兒社會能力的「利他行為」、「合群合作」、「互動行為」、「禮貌」、「獨立自主」和「社會能力」分別為依變項，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建設型家庭互動」的幼兒在各項與整體社會能力都顯著高於「衝突型家庭互動」的幼兒與「破壞型家庭互動」的幼兒，而「衝突型家庭互動」的幼兒在各項與整體社會能力又顯著高於「破壞型家庭互動」的幼兒。以相同方式分析幼兒性別與幼兒社會能力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女生在各項與整體社會能力均顯著高於男生(見表三)。

五、討 論

從上述家庭互動型態分析結果來看，本研究結果所顯示的家庭互動型態呈現相稱的型態面貌(symmetrical profiles)，而相稱的型態面貌呈現二個層次的意涵。第一個層次是在父母之間，也就是父母彼此以正向回應來因應婚姻衝突並知覺配偶的支持，或是雙方均以爭執消極方式來因應婚姻衝突並知覺配偶的抵制。針對如此相稱

表三 家庭互動型態、子女性別於社會能力之平均值、標準差和F值

	社會能力					
	利他行為	合群合作	互動行為	禮貌	獨立自主	社會能力
家庭互動型態	M(SD)	M(SD)	M(SD)	M(SD)	M(SD)	M(SD)
建設型	32.53(5.56)	39.58(5.66)	34.97(4.73)	37.08(6.08)	37.32(6.01)	181.50(24.19)
衝突型	29.62(6.38)	36.70(6.20)	32.15(5.53)	34.23(6.16)	33.79(6.01)	166.51(26.66)
破壞型	26.46(7.04)	33.21(7.90)	29.42(6.99)	30.88(7.65)	31.60(6.41)	151.58(32.55)
$F_{(2,741)}$	46.537***	47.981***	50.552***	44.121***	48.377***	61.191***
Scheffe	建設型>	建設型>	建設型>	建設型>	建設型>	建設型>
事後比較	衝突型>	衝突型>	衝突型>	衝突型>	衝突型>	衝突型>
	破壞型	破壞型	破壞型	破壞型	破壞型	破壞型
子女性別						
男	28.99(6.65)	36.28(6.99)	32.22(6.07)	34.05(6.78)	34.02(6.59)	165.59(29.55)
女	31.97(5.99)	38.68(6.04)	33.80(5.40)	35.98(6.57)	36.10(6.12)	176.55(26.67)
$F_{(1,742)}$	41.004***	24.854***	13.908***	15.423***	19.684***	28.041***

*** $p < .001$

的型態面貌，Ridley、Wilhelm和Surra (2001)在探討夫妻衝突反應型態時指出，依據相依理論(interdependence theory)，我們可以假設夫妻形成相依的結構或穩定的交換型態，在夫妻相依關係中，夫妻表現互惠或對等的反應是可預期的，因此一方的參與反應會引發另一方的參與反應，一方的疏離反應會引發另一方的疏離反應。這個現象亦出現在本研究的家庭互動型態，父母一方的正向行動或知覺引發另一方的正向行動或知覺，一方的負向行動或知覺引發另一方的負向行動或知覺。研究者認為家庭互動中，包括婚姻衝突因應或教養聯盟，父母正向的表現或許存有彼此激勵作用，而負向的表現或許存有彼此惡化作用，所以在型態上有此相稱的型態面貌。若再進一步來看，相稱的型態面貌之第二個層次的意涵則表現在婚姻衝突因應和教養聯盟之間，婚姻衝突正向回應和教養聯盟知覺配偶支持這些正向行為和知覺在型態中相互結合在一起，相對的，婚姻衝突爭執消極和教養聯盟知覺配偶抵制這些負向行為和知覺也相互結合在一起。由此觀之，家庭互動型態所展現的相稱型態面貌，基本上也反映了婚姻衝突因應和教養聯盟二者會因溢出效應而相互作用。

接著，從家庭互動型態與幼兒社會能力關係的結果來看，首先，過去國外相

關研究結果發現婚姻衝突頻率、形式與強度、內容、解決與兒童適應有關(Davies & Cummings,1994)，或是父母知覺配偶對其教養的支持程度，與兒童自我調節能力或行為問題均有所關聯(Belsky, Putnam, & Crnic, 1996; Brody & Flor, 1996; Emery, Fincham, & Cummings,1992; Schoppe, Mangelsdorf, & Frosch, 2001)。雖然本研究是由父母婚姻衝突因應和教養聯盟所構成的三種家庭互動型態以及幼兒社會能力加以切入，但研究結果與上述相關研究可以相互呼應。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僅家庭互動型態本身具有前述之不同特徵，且不同家庭互動型態中的幼兒，其社會能力亦有所不同，不論是「利他行為」、「合群合作」、「互動行為」、「禮貌」、「獨立自主」各社會能力面向、或整體的「社會能力」，「建設型家庭互動」的幼兒表現最好，其次是「衝突型家庭互動」的幼兒，而「破壞型家庭互動」的幼兒其社會能力是最差的。

考量上述結果可能的原因，我們可以整合情緒安全假設與家庭互動品質機制的理論觀點，也就是不同的家庭互動型態可能反映了不同的家庭互動品質，而不同的家庭互動品質創造不同的家庭氛圍，在不同家庭氛圍中，經由影響孩子情緒安全感受的機制，而作用在孩子的社會能力發展。例如，在「建設型家庭互動」中，父母相互以正向回應來因應婚姻衝突以及知覺彼此相互支持對方的教養，在此家庭互動型態，形成了安全和諧的家庭互動品質，並因而增加孩子的安全感，使得孩子在社會互動中較易展現正向行為，因而提升其社會能力。相對的，在「破壞型家庭互動」中，父母相互以較為高度爭執、消極策略來因應婚姻衝突以及較為高度知覺彼此相互抵制對方的教養，在此家庭互動型態，形成了破壞對立的家庭互動品質，在此家庭氛圍中，孩子可能感受到相當高程度的不安全感，因此十分不利於社會能力的發展。至於「衝突型家庭互動」，父母也是相互以爭執、消極策略來因應婚姻衝突以及知覺彼此相互抵制對方的教養，但程度不若「破壞型家庭互動」那麼高，在此家庭互動型態，也形成了緊張不安的家庭互動品質，對於孩子的安全感也有負面的影響，於此情況下，孩子社會能力也無法良好發展。

最後，從幼兒性別來看，如同過去相關研究的發現一般(陳若琳，2002；Crombie, 1988; Denham et al., 2001; Putallaz et al., 1995; Prior et al., 1993)，本研究結

果顯示女生在各項社會能力均優於男生。其可能的原因，可能來自於氣質差異(Prior et al., 1993)，或是直覺性的差異(Putallaz et al., 1995)，除此之外，以本研究社會能力各面向來看，或許這些能力面向比較符合社會期待的女生角色特質能力，經由男女孩性別角色社會化過程(Baruch & Barnett, 1981; Serbin et al., 1973; Stein & Bailey, 1973; Tauber, 1979)，女生在社會能力的表現較好。

不過有趣的是，幼兒性別並未與家庭互動型態產生顯著的交互作用，顯示男女幼兒不會因不同家庭互動型態而在社會能力上有顯著差異。本研究結果比較接近婚姻衝突與子女性別的後續研究發現，即婚姻衝突和男女孩適應、內外化行為問題都有顯著的關聯。探究其可能的原因，其中之一可能是家庭互動型態所反映的家庭互動品質及其對孩子情緒安全的作用是跨越孩子性別，因此不論男女幼兒，在「建設型家庭互動」表現最好的社會能力，在「破壞型家庭互動」表現最差的社會能力。其中之二可能可以由幼兒對家庭互動的知覺來加以解釋。Grych和Fincham(1990)提出認知一脈絡架構觀點，強調婚姻衝突乃藉由孩子對於婚姻衝突的知覺，即評估衝突的意義、知覺威脅的程度、衝突原因和責任的歸因、以及對於因應衝突的效能期望，進而影響孩子的適應。延伸上述觀點，本研究以幼兒為對象，由於幼兒年紀尚小，因此男孩或女孩對於家庭互動脈絡的知覺可能還未有顯著的不同，所以幼兒性別並未與家庭互動型態產生顯著的交互作用。

六、研究限制與結論

本研究主要的限制在於研究對象只限於大台北地區，故只能描繪出大台北地區學齡前幼兒父母家庭互動型態、子女性別與幼兒社會能力的關聯。未來研究方向之一或許可將研究對象擴展到我國其他地區，以便更瞭解我國父母和幼兒的情形。另一個研究限制是在於幼兒社會能力的測量，幼兒社會能力的測量是由目標幼兒的幼兒園老師依據平日對該幼兒的觀察瞭解加以填答。由於約有133位幼兒園老師參與評量目標兒童的社會能力，本研究有困難處理這些老師在評量標準上是否有顯著差異，未來研究可考慮加入其他評量者加以共同評量，以便瞭解評量者的一致性。還

有，本研究整合情緒安全假設與家庭互動品質的理論觀點，做為家庭互動型態與幼兒社會能力關係之機制，亦即不同家庭互動型態反映不同家庭互動品質，而不同家庭互動品質會作用在孩子情緒安全感，並因而導致社會能力有所不同。針對此項觀點，未來可從事研究進一步加以更深入的檢視。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探討家庭互動型態、子女性別與幼兒社會能力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家庭互動具有「建設型家庭互動」、「衝突型家庭互動」、和「破壞型家庭互動」三種型態，且這三種型態在父母之間、以及婚姻衝突因應和教養聯盟之間均呈現相稱的型態面貌。除此之外，不同家庭互動型態中的幼兒，其社會能力表現亦有不同，即「建設型家庭互動」中的幼兒，其社會能力最好，「衝突型家庭互動」中的幼兒居中，表現最不好的是「破壞型家庭互動」中的幼兒。至於孩子性別方面，女生的社會能力優於男生，但男女幼兒不會因不同家庭互動型態而在社會能力上有顯著差異。

針對這些結果，在理論建構上，有其重要的意義，第一，本研究擴展過去相關研究課題，例如，在婚姻衝突方面，過去相關研究中，偏向頻率、形式與強度、內容和解決四個面向，而本研究以婚姻衝突因應為主，在教養聯盟方面，過去相關研究中，較多研究探討父母實際支持或抵制配偶的行為，本研究則以父母知覺配偶的支持或抵制為主，在兒童發展方面，過去相關研究中，較多以行為問題為指標，而本研究則以正面的社會能力為指標。本研究發現可增加我們對於家庭系統和兒童發展不同面向的瞭解。第二，本研究同時檢視婚姻和教養聯盟二個家庭次系統，同時，本研究分析父母婚姻衝突因應和教養聯盟所形成的家庭互動型態，藉由家庭互動型態，我們可以對於父母之間、婚姻衝突因應和教養聯盟之間的互動有更統整的理解，並協助釐清家庭系統的複雜性。第三，對幼兒社會能力而言，家庭互動型態確有作用，本研究發現可為家庭系統和兒童發展的關聯提供多一層的釐清和瞭解。

至於在親職教育實務的應用上，婚姻衝突或父母教養在過去較受到大家的注意。由本研究結果來看，即使是處在父母婚姻衝突中，父母如何因應他們的婚姻衝突非常重要。同樣的，父母教養孩子的方式對兒童發展雖深具影響，但父母彼此在教養議題上的互動也很重要。以兒童發展的角度而言，如何讓父母察覺自己的家庭

互動型態，並增進父母建設型家庭互動的能力，乃是關心兒童發展者可以努力之處。不過，在此之際，親職教育實務者還必須著力於讓父母體察彼此之間是相互影響的，而婚姻衝突因應和教養聯盟也是相互作用的，因此，如何相互正向互動是十分重要的。

附 註

本論文是九十五年度輔仁大學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計畫編號40-95-3-106-435。

參考文獻

- 呂翠夏(1993)：〈婚姻衝突對幼兒社會情緒發展之影響〉。《台南師院學報》，26卷，頁255-275。
- 呂翠夏(2002)：〈學前幼兒家庭之共親職與其相關因素：婚姻關係與性別角色態度〉。《台南師院學報》，36卷，頁1-18。
- 林亞寧(2003)：《新婚夫妻婚姻信念、衝突因應策略與婚姻調適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林惠雅(2007)：〈學齡前兒童之父母的共親職與親職感受的關係〉。《本土心理學研究》，27，頁177-233。
- 陳若琳(2002)：〈母親親職壓力與教養品質對幼兒社會能力影響之探討-以台北縣幼兒母親為例〉。《輔仁學誌：法管理學院之部》，35期，頁51-78。
- 陳若琳(2005)：〈幼兒社會能力量表〉。未發表。
- 陳若琳、李青松(2001)：〈台北縣雙工作家庭父母親的親職喜悅與壓力之探討〉。《生活科學學報》，7期，頁157-180。
- 陳富美、利翠珊(2004)：〈夫妻的育兒經驗：親職分工與共親職的探討〉。《中華心理衛生學刊》，17卷4期，頁1-28。
- 陳惠雯、林世華、吳麗娟(2001)：〈婚姻衝突、家庭界限與青少年子女適應之相關研

- 究》。《教育心理學報》，32卷2期，頁143-166。
- 黃玉、樓美玲(2004)：〈青少年的父母婚姻衝突、負向情緒與偏差行為之相關性〉。《醫護科技學刊》，7卷2期，頁129-139。
- 張虹雯、郭麗安(2000)：〈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運作與兒童行為問題之相關研究〉。《中華輔導學報》，8期，頁77-110。
- Aldous, J. (1977). Family interaction pattern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 105-135.
- Amato, P. R., & Fowler, F. (2002). Parenting practices, child adjustment, and family diversit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4, 703-716.
- Baruch, G. K., & Barnett, R. C. (1981). Competence-related behaviors of preschool girls. *Genetic Psychology Monographs*, 103, 79-103.
- Baumrind, D. (1977). *Socialization determinants of personal agenc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biannual meeting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New Orleans.
- Belsky, J. (1981). Early human experience: A family perspectiv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7, 3-23.
- Belsky, J., Putnam, S., & Crnic, K. (1996). Coparenting, parenting and early emotional development. *Child Development*, 74, 45-55.
- Brody, G. H., & Flor, D. L. (1996). Coparenting, family interactions, and competence among African American youths. *Child Development*, 74, 77-91.
- Buehler, C., Krishnakumar, A., Stone, G., Anthony, C., Pemberton, S., Gerard, J., & Barber, B. (1998). Interparental conflict styles and youth problem behaviors: A two-sample replication stud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0(1), 119-132.
- Crombie, G. (1988). Gender differences: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skills assessment and training.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 17(2), 116-120.
- Davies, P. T., & Cummings, E. M. (1994). Marital conflict and child adjustment: An emotional security hypothe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6(3), 387-411.
- Davies, P. T., & Cummings, E. M. (1998). Exploring children's emotional security as a mediator of the link between marital relations and child adjustment. *Child Development*,

69, 124-139.

- Davies, P. T., Harold, G. T., Goeke-Morey, M. C., & Cummings, E. M. (2002). Introduction and literature review. *Monographs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67(3), 1-26.
- Denham, S., Mason, T., Caverly, S., Schmidt, M., Hackney, R., Caswell, C., & De Mulder, E. (2001). Preschoolers at play: Co-socialisers of emotional and social compet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5(4), 290-301.
- Emery, R. E. (1982).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the children of discord and divorc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2, 310-330.
- Emery, R., Fincham, F., & Cummings, E. M. (1992). Parenting in its context: Systemic thinking about parental conflict and its influence on children.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0(6), 909-912.
- Erel, O., & Burman, B. (1995). Interrelatedness of marital relations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 A meta-analytic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8, 108-132.
- Gable, S., Belsky, J., & Crnic, K. (1992). Marriage, parenting, and child development: Progress and prospect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5, 276-294.
- Gable, S., Crnic, K., & Belsky, J. (1994). Coparenting within the family system. *Family Relations*, 43, 380-387.
- Grych, J., & Fincham, F. (1990). Marital conflict and children's adjustment: A cognitive-contextual framework.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8, 267-290.
- Harold, G. T., & Conger, R. D. (1997). Marital conflict and adolescent distress: The role of adolescent awareness. *Child Development*, 68, 330-350.
- Harold, G. T., Shelton, K. H., Goeke-Morey, M. C., & Cummings, E. M. (2004). Marital conflict, child emotional security about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child adjustment. *Social Development*, 13(3), 350-376.
- Hess, R. D., & McDevitt, T. M. (1984). Some cognitive consequences of maternal intervention techniques: A longitudinal study. *Child Development*, 55, 2017-2030.

- Hetherington, E. M., Cox, M., & Cox, R. (1982). Effects of divorce on parents and children. In M. E. Lamb (Ed.), *Nontraditional families*.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 Holden, G. W., & Richie, K. L. (1991). Linking extreme marital discord, child rearing, and child behavior problems: Evidence from battered women. *Child Development*, 62, 311-327.
- Howes, P. W., & Markman, H. J. (1989). Marital quality and child functioning: A longitudinal investigation. *Child Development*, 60, 1044-1051.
- Howes, P. W., & Markman, H. J. (1991). *Longitudinal relations between premarital and pre-birth adult interaction and subsequent parent-child attach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Seattle, WA.
- Jenkins, J. M., & Smith, M. A. (1991). Marital disharmony and children's behavior problems: Aspects of a poor marriage that affect children adversely.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23, 793-810.
- Jouriles, E. N., & Farris, A. M. (1992). Effects of marital conflict on subsequent parent-son interactions. *Behavior Therapy*, 23, 355-374.
- Jouriles, E. N., Murphy, C. M., & O'Leary, K. D. (1989). Interspousal aggression, marital discord, and child problem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7, 453-455.
- Katz, L. F., & Gottman, J. M. (1996). Spillover effects of marital conflict: In search of parenting and coparenting mechanisms. In J. P. McHale & P. Cowan (Eds.), *Understanding how family-level dynamics affect children's development: Studies of two-parent families* (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development, vol. 74) (pp. 57-76). NY: Jossey-Bass.
- Lindsey, E. W., & Mize, J. (2001). Interparental agreement, parent-child responsiveness, and children's peer competence. *Family Relations*, 50(4), 348-355.
- McCubbin, H. I., & Patterson, J. M. (1983). The family stress process: The double ABCX model of adjustment and adaptation. *Marriage and Family Review*, 6, 7-37.

- McHale, J. P. (1997). Overt and covert coparenting processes in the family. *Family Process*, 36(2), 183-201.
- McHale, J. P., Johnson, D., & Sinclair, R. (1999). Family dynamics, preschoolers' family representations, and preschool peer relationships. *Early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10, 373-401.
- McHale, J. P., Lauretti, A., Talbot, J. A., & Pouquette, C. (2002).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in the psychological study of coparenting and family group process. In J. McHale & W. Grolnick (Eds.),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in the psychological study of families* (pp.127-165). Mahwah, NJ: Erlbaum.
- McHale, J. P., & Rasmussen, J. L. (1998). Coparental and family group-level dynamics during infancy: Early family precursors of child and family functioning during preschool.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10(1), 39-59.
- Miller, N. B., Cowan, P. A., Cowan, C. P., Hetherington, E. M., & Clingempeel, W. G. (1993). Externalizing in preschoolers and early adolescents: A cross-study replication of a family model.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9, 3-18.
- Porter, B., & O'Leary, K. D. (1980). Marital discord and childhood behavior problems.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18, 105-117.
- Prior, M., Smart, D., Sanson, A., & Oberklaid, F. (1993). Sex differences in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from infancy to 8 year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32, 291-304.
- Putallaz, M., Hellstern, L., Sheppard, B. L., Grimes, C. L., & Glodis, K. A. (1995). Conflict, social competence, and gender: Maternal and peer contexts. *Early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6, 433-447.
- Reid, W. J., & Crisafulli, A. (1990). Marital discord and childhood behavior problems.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18, 105-117.
- Ridley, C. A., Wilhelm, M. S., & Surra, C. A. (2001). Married couples' conflict responses and marital quality.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8(4), 517-534.

- Rose-Krasnor, L. (1997). The nature of social competence: A theoretical review. *Social Development, 6*, 111-135.
- Schoppe, S. J., Mangelsdorf, S. C., Frosch, C. A. (2001). Coparenting, family process, and family structures: Implications for preschoolers' externalizing behavior problem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5*(3), 526-545.
- Serbin, L. A., O'Leary, K. D., Kent, R. N., & Tonic, I. J. (1973). A comparison of teacher response to the pre-academic and problem behavior of boys and girls. *Child Development, 44*, 796-804.
- Spence, S. H. (2003). Social skills training with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Theory, evidence and practice. *Child and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8*(2), 84-96.
- Stein, A. H., & Bailey, M. M. (1973). The socialization of achievement orientation in femal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0*, 345-366.
- Steinberg, L., Lamborn, S. D., Darling, N., Mounts, N. S., & Dornbusch, S. M. (1994). Over-time changes in adjustment and competence among adolescents from authoritative, authoritarian, indulgent, and neglectful families. *Child Development, 65*, 754-770.
- Talbot, J. A., & McHale, J. P. (2004). Individual parental adjustment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ital and coparenting quality. *Journal of Adult Development, 11*(3), 191-205.
- Tauber, M. A. (1979). Sex differences in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styles during a free-play session. *Child Development, 50*, 981-988.
- Wentzel, K. R., Feldman, S. S., & Weinberger, D. A. (1991). Parental child rearing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boys: The mediational role of social-emotional adjustment.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11*, 321-339.



Family Interaction Patterns, Children's Gender and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HUEY-YA LIN

Purpose: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family interaction patterns and children's gender on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Methods:** The subjects of the present study were 744 families with children of ages 5 to 6, including fathers, mothers and children.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ree symmetrical profiles of family interaction patterns were "constructive pattern of family interaction", "conflictive pattern of family interaction", and "destructive pattern of family interaction". In addition, children in "constructive pattern of family interaction" performed the highest level of social competence and children in "destructive pattern of family interaction" performed the least level of social competence. Girls performed higher level of social competence than boys. Nevertheless, children's gender and family interaction patterns did not show significant interactive effect on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Conclusions:** Due to examinations of family interaction patterns and their effects on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complexity of family systems could be clarified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ffects of family systems on children development could be improved.

Key words: family interaction pattern, marital conflict, parenting alliance,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coparenting